

# 《乐记》成书题外辨

李广赞 闫冲

[内 容 提 要] 《乐记》是中国的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是我国最早一部具有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其内容涉及音乐思想、音乐创作、器乐研究、乐器制作、乐律研究、音乐人物、音乐言论等音乐领域,关于其成书年代及其作者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大的争论,笔者通过将《乐记》的思想及一些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进行比较从侧面论述自己对此问题的浅见。

[关 键 词] 《乐记》/作者/成书年代。

[内容类别词] 中国音乐史

《乐记》是先秦儒家学派论“乐”的言论,它涉及音乐思想、音乐创作、器乐研究、乐器制作、乐律研究、音乐人物、音乐言论等音乐领域<sup>[1]</sup>,内容广泛,关于其成书年代及其作者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一桩公案,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如今学术界对此有以下四种说法:

1.1943年郭沫若根据史料《隋书·音乐志》之《奏答》、《史记正义》写了《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认为今存《乐记》一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此后杜国庠、杨公骥、董健、杨荫浏、周柱铨、冯浩轩、周来祥、金钟、吕骥等也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均赞同公孙尼子为《乐记》作者这一说。郭沫若的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奏答》中“《乐记》取《公孙尼子》”一句;二是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

2.1964年丘琼荪在《历代乐志乐律校释序》中载有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丘琼荪认为历史上“公孙尼子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时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撷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认为《乐记》乃汉武帝时的杂家公孙尼所为,而非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公孙尼子所为<sup>[2]</sup>。

3.1975年《乐记批注》一书附录《关于《乐记》作者与成书》认为《乐记》成书于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蔡仲德先生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称为现代持“具体汉儒说”的代表人物。针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1980年蔡仲德在《〈乐记〉作者问题辨证》中认

为“《乐记》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类的说法都不足为据,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首先,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一样,《奏答》此说也没有提出任何依据,也只是一种揣测;其次,《奏答》既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又采用《汉书·艺文志》“刘德作《乐记》”一段文字,而未加以否定,前后不一,自相矛盾。<sup>[3]</sup>

4.部分学者认为《乐记》一书不是具体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经过“汉儒”加工润色后的理论著作,把《乐记》的成书年代断定为汉初,对其作者却没有让人信服的观点,甚至让人认为这是在折衷以上的观点。

可见以上四种说法关键点是史料出现了冲突,让人无法辨认真假,其中提出的观点不同就在于对史料的解释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应当是距离《乐记》成书年代最近、最具权威的论据性参考资料,他提出了“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隋唐两代史书与其有出入。《隋书·音乐志》、《史记正义》相隔不远,但是其中的观点模棱两可,以至近前些年学术界展开《乐记》成书辩的论战,短短几十年作品层出不穷。20世纪对《乐记》的研究有论著6部,论文86篇……<sup>[4]</sup>再加上近几年的一些作品应该不下数百篇。

众多作品难达成一致意见问题就在于史料的冲突,史料的突破需要新的考古发现给予证明,因此,笔者认为再从这些翻过无数遍的史料中去辨析《乐记》成书的年代、作者已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从《乐记》的内容思想、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进行比较应该不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作者简介:李广赞(1980~),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7级研究生。

闫冲(1984~)女,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教师。

假设一:倘若《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那它的产生时代就应该是在春秋末战国初,公孙尼子是孔子的弟子之一。因此,公孙尼子时代要早于孟子,更早于荀子。众所周知,孟子批判百家思想,孟子对他人的学说可以说一概嗤之以鼻,加以攻击,还要声称自己攻击辨难其他学派是迫不得已之事。荀子继承百家思想,而荀子与孟子不同,他既对诸子百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同时对百家之学又有所继承和综合。对于“百家”中这样两位重要的“挑剔”人物,竟然没有对《乐记》提出丝毫的“只言片语”加以赞扬和批判,即使他们缺乏自我批判精神,但是学派的自豪意识应该有的,这在人之常情上就说不过去。笔者认为如果《乐记》产生在孟子、荀子之前,两位继承者应对《乐记》作出高度赞扬以提高自己学派地位,这种情况才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他们没有,这说明《乐记》产生极大可能是产生在孟子、荀子之后。

如果说他们不会批判自己的学派,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在批判别人的言论里还保存着谦虚务实、不爱吹嘘的品德,那批判别人的目的也就没有了意义。蔡仲德先生的作品《〈乐记〉作者辩证》将“公孙尼子”《乐记》与《乐论》、《吕氏春秋》、《易系辞》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乐记》全文五千余字,荀子的《乐论》全文一千三百多字,二者相同部分竟有七百多字,这说明了——抄袭或继承。到底谁先谁后,蔡仲德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乐论》中的文字主题突出,层次分明,一气呵成,是有机整体,而越级的文字则是散现在《乐记》个篇中;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荀子是富有独创性的大儒,不至于整抄前人的文字以为已有,而《乐记》则明言采诸子之言“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抄袭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笔者认为《乐记》的思想内容要远比《乐论》丰富,应当是后人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这也说明《乐论》在前《乐记》在后<sup>[5]</sup>。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产生于孟子、荀子之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假设二:《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据班固《后汉书》记载刘德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之兄,约生于公元前176年至公元前170年之间,死于元光五年约公元前130年左右,公元前155年封王,酷爱古书,随后就有毛公、贯公等属臣。也就是说这时就已经具有著述《乐记》的时间条件。

《史记·乐书》作者司马迁(前135年~前93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陕西韩阳县)人。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sup>[6]</sup>。由以上材料可知在刘德死后约22年后司马迁就有可能把《乐记》收录到《史记》中去,我国的古代很早就有史官,为什么这件历史事件没有在司马迁以前的朝代或帝王的史官记载或涉及而偏偏在刘德死后不久由司马迁完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觉得这样的追问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绝对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再看汉代另一位杰出人物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

广川人(河北景县内)人,景帝时的博士。武帝时,它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将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发展为“天人感应”论。并于前134年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儒学正式列为官学,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先声。<sup>[7]</sup>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刘德曾至长安朝武帝,献雅乐,其所娴雅月,得到公孙弘、董仲舒的赞赏,认为音中正雅,得以立为太乐。此说明刘德与董仲舒有交往且可能是益友,那么他就有机会接受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笔者认为这也是《乐记》的思想体系当中隐含着天人感应言论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天人感应思想是由董仲舒提出的,通过《乐记》中具有天人感应学说而且时间上结合得如此严密,可以推论《乐记》的作者既有可能就是刘德及其手下儒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

通过以上语言的论述再加上以前蔡仲德先生有理有据的辩驳,笔者认为蔡仲德先生的观点还是比较符合逻辑、具有说服力的,因而,赞同蔡先生《乐记》成书于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的观点。鉴于各位前辈关于《乐记》成书及作者的作品之多和笔者学术水平有限,以上两种假设仅是笔者个人的浅见,不成熟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6月版。

[2]孙星群《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中国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3]蔡仲德《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4]孙星群《乐记研究百年回顾》,《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

[5]同[3]。

[6]赵德贵《简明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7]同[6]。

参考文献:

[1]蔡仲德.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孙星群.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中国音乐学院学报,1998(4)

[4]孙星群.乐记研究百年回顾.中国音乐,2000(4)

[5]蔡仲德.音乐之道的探求——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1)

[6]赵德贵.简明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编辑 朱默涵)